

重庆大学建校初期办学理念的再认识

张志芳

(重庆大学 校史办公室,重庆 400030)

摘要:重庆大学的创建人以创设一所现代大学为标杆,明确提出了“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理念,并以此选择建筑校址、开办院系、延聘师资、建立管理制度、购置设备。确立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方式和教育管理方式,不仅为学校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办学理念;建校;重庆大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5-0152-03

The Re-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s of Ru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in Initial Stage

ZHANG Zhi-fang

(History Office,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founders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regarded founding a modern university as the range pole, proposed clearly the ideas of running a university of “studying academy, bringing up talents, helping homeland, shaking and leading the society”, and so to choose the location of campus, run the institute department, engage teachers and set up management system, purchase equipment. The Establishing of the mode of talents bringing up and educational management of “taking humans as the basis” had not onl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etting-up of the university, but also offered valuable spirit impetus for its long-term development.

Key words: idea of running university; found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University

重庆大学创建于1929年,它一诞生就以建设一所现代大学为定位,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办学理念。在建校75周年之际,回眸历史,反思建校初期的办学思想,对促进学校在新时期的办学进程中跨越式发展颇有意义。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9世纪90年代中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初步发展,中国内陆各省也陆续开始兴办大学。在发展初期,不少大学是由书院与旧式学堂改换或升级而成。其办学理念更是陈杂纷云,有的虽名为大学,从办学的模式到课程内容的设置,按现代大学的要求衡量,有着很大差距。应时代呼唤,重庆大学的创建是由在成都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沈懋德、吕子芳、吴芳吉等川东籍教授与重庆绅耆奔走规划,策动川省当局筹设的。在建校伊始,便以当代先进的办学理念为指

导,从先办文理两预科入手,为重庆创办了第一所现代高等大学,开创了西南高教事业新风。

重庆大学建校初期的办学理念,见端于《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重庆大学筹备会宣言》和《重庆大学宣言》等创建时期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几易其稿,由留学东京帝国大学的学者沈懋德、著名爱国诗人吴芳吉等亲笔撰写,他们用先进的现代文明思想,分析论证了创办重庆大学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筹备会成立宣言》中,他们强烈呼吁“以西南交通最便之域,文化输入首当之冲、货殖素号殷邦,冠盖夸于列郡”的重庆,必须要建立一所“完备弘深之大学”。并指出,“此盖全川教育发展应有之进程,与吾七千万人最低之需要”。特别可贵的是“宣言”针对当时的实际,深刻阐明重庆大学的创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明确提出了“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

* 收稿日期:2004-04-20

作者简介:张志芳(1953-),女,重庆人,重庆大学校史办公室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校史研究。

邦、振导社会”的办学思想,这是对重庆大学建校初期办学宗旨的全面概括,具有现代办学理念的重要特征。比较教育研究表明,古代学校教育和政治、经济制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和生产水平、科学技术没有直接的联系,这表现为它是上层建筑,有阶级性而无生产性;而现代学校教育,则发生了根本变化,和科学技术、生产水平也发生了直接的联系。简言之,教育和社会生产有没有直接联系,是区别于学校和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标志。重庆大学建校初期的十六字办学宗旨,在《重庆大学宣言》中还作了进一步的诠释,文曰:“重庆外受江汉委输,内作川康辘轳,……大小工厂,岁月兴立,如使工商两业缺乏专门人才,则操奇计赢、不足与外人竞进,投师工匠,亦必向远方征求,财贿外流,大利坐丧。如重庆大学设置工商理科,数年之后,阡阡必多通才,制作必臻美利,盖商场工厂,触目即是,实地练习,功倍可期,而一埠之中,忽有此最高学府,……于以增进本埠之繁荣,拓殖西南之福利,甚为关系又至重钜也。”办学宗旨决定着立校的基点和发展方向,从《宣言》可以看到,筹设和创办重庆大学是为了工厂生产的发展、商场的繁荣,以此造福重庆桑梓,造福西南以至整个社会。一句话,办学的目标是和社会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而重庆大学立校的基点和确定的办学方向都具有现代大学的鲜明特征。

培养人才是开办高等学校的永恒主题。这一主题既是办学的核心,又是检验学校发展的一项重要标准。围绕这一核心,《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等三个建校的重要文献和学校制定的教风、学风警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人才的现状、人才的巨大作用和如何培育人才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这是建校初期办学理念的又一个亮点。

《重庆大学宣言》指出,“人类之文野,国家之理乱,悉以人才为其主要之因,必人才日出,然后事业日新,必事业日新,然后生机永畅,世界所以进化无疆,国家所以长存不敝,胥赖于此。”《宣言》还指出,商埠之建筑,市政之设置,市场之开辟等等事项,与培养人才相比较都是枝节事情,“根本建设,厥在人才;人才之深造,端资最高学府。”“宣言”明确昭示,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国家的治理都离不开人才。强调只有不断培养人才,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世界才能不断前进,国家才能长久不衰。“宣言”既对人才问题作了宏观大层面的分析,也没有忘记将人才培养与

人们常见的各项工作进行比较,提出了人才培养是各项建设的根本,人才培养要依靠知识资源丰富的高等学府。“宣言”站得高,视野开阔、全面,对人才的重要作用 and 大学办学功能的认识,都闪烁着真知的光芒,至今仍具启发性。

建校之后制定的学风警言和教风警言,既是重庆大学办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办学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两个警言都是围绕着培养人才这一目标制定的,只不过各有侧重。学风警言是对学生成才的要求;教风警言则是对教师育人行为的规范。

一般来说,大学对培养中高级专门人才具有突出的作用。大学阶段既是为成才打基础的“学习准备期”,又是向“创造活动期”转变的过渡时期。大学期间基础打得如何,第一步跨得怎样,直接关系到今后的方向、跨越的高度和持续性。为了帮助学生在学习时期更好地成长,学校特别制定了“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成才要求警言。这个警言只有短短的12个字,但思想内涵却相当丰富、深刻。它包括人才成长的前提(耐劳苦),又指明了成才的途径(勤学业),它提倡生活要求要尚俭朴,又明示做人的根本应爱国家。警言既吸取了中华人才观中评价人才的德才兼备思想,又突出了成才者必须有激扬的爱国精神。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学风警言这一办学理念,不但折射出了创办重庆大学的爱国知识分子创造性的思想火花,而且警言的12个字是字字千钧,句句无价。

在建校初期的办学理念中,能与学风警言媲美的还有教风警言。重庆大学的教风警言内涵深广,既汲取了中华教育传统的精华,又蕴含了现代办学思想,兼具继承性。

《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917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教育要旨有三:其一,抱定宗旨;其二,砥砺德行;其三,敬爱师友。从我国古代的教育家到20世纪前期的蔡元培,在办教育中,无一不注重德行。对于在育人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教师,则有更严的要求。重庆大学秉承这一教育文化传统,建校初期就以教风警言的方式,对老师提出了以下要求:“以身示范,注重实践,教导结合,潜移默化,爱护学生,亲如家人,关心学校,参予管理。”

“以身示范”特别强调作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品格,要以“学为人师,师垂典范,行为示范,范示群论”(当代教育家徐特立语)来严格要求自己。现代的教

育观念认为,教育不但是传承文化知识的载体,而且是促进科学向社会生产力转变的平台。“警言”中“注重实践”,指的是要注重用知识去解决实际中的问题,要注意技能的训练。“警言”中提出的“教导结合,潜移默化”的育人方法;“爱护学生、亲如家人”的教育观念,以及“关心学校,参与管理”的热爱教育和教授治校的思想等等,蕴含着现代教育的科学性、民主性、开放性等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概括地说,教风警言这32个字,包含了重庆大学的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教育精神。

从1929年以来,设计、规划重庆大学的沈懋德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不仅按照“宣言”等建校初期重要文献提出的现代教育理念办学,并按照这一理念进行了办学实践探索。他们参照世界现代大学的要求,选择建筑校址、开办院系、延聘师资、建立管理制度、购置设备等。为了选择永久校址,营造一个宜于育人的环境。由重庆绅耆、筹委温少鹤自备汽轮,载着筹办重庆大学的学者们,上溯两江,选定了头依浮屠,面对清江、松柏掩映,风景秀丽,又有古镇为依托的沙坪坝,一次就购买了900余亩土地,修建校舍,开辟运动场地。仅此一举,就为学校的长足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让学生正确掌握外语的音律,使学生发音纯正,则聘请外籍教授任教。在延聘师资上,创办人及后继者深悉“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大学之大,乃大师也”之理,广纳贤才,延聘专家治校。先后聘请了李四光、马寅初、傅鹰、何鲁、冯简、柯召、吴宓、艾芜等大师级学者来校任教。至建国前,学校教授阵容已相当整齐,据不完全统计,正教授已达到794名。在设置院系上,既适应社会经济需要,又根据科学发展要求和社会文明进步来创办。如工学院开办的矿冶系,理学院开办的地质系都源于振兴工业,复兴民族的需要。1938年,学校根据重庆商贾云集,又是西南地区的通商口岸,开设了商学院。在管理制度上,建校初期制定了一套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30年代,学校就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教学质量。英文、数学、语文三门课聘请主任教员授课。同时健全奖惩制度,规范教学秩序。凡学习成绩列为全校优秀者给予奖励,并可免交学费。当时,学校还拟定了各项章程制度,如:《重庆大学预

科课程标准》、《重庆大学教员延聘细则》等等。正是由于重庆大学建校初期按照西方国家先进教育模式办学,到四十年代,学校呈现规模宏大、蒸蒸日上的之势。1946年已发展成为理、工、商、文、法、医齐备的综合性国立大学。从最近学校访问一位台湾老校友得知,由于重庆大学的快速发展,抗战时期当局政府曾准备把地处大后方陪都的重庆大学办成中国的“剑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建校初期重庆大学通过10多年的努力,历经艰难险阻,终将创办时仅有文理两个预科班,学生不足50人的重庆大学,发展成为拥有理、工、文、法、商、医六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至于这一时期,重庆大学的办学情况和成绩,《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史》一书的作者,有这样一段评价:“重庆大学的建立,不仅把沙磁地区原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和近代产业文化的进步精神继续推向前进,同时在争取民族复兴的爱国、科学、民主精神鼓舞下,把重庆地区的文化含量和精神品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解放以后,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重庆大学得到了持续的发展,1960年被国家首批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如今,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中,重庆大学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使学校发展成了拥有研究生院,本科专业涵盖理、工、文、经、管、法、教育等学科门类,并进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回眸过去,我们更要满怀爱国激情,坚持现代办学理念,让老一辈重大人努力形成的“耐劳苦、尚俭朴、勤学业、爱国家”的优良学风激励一代又一代重大人去创造更大的光荣。

参考文献:

- [1]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重庆市档案馆历史档案资料,1929.
- [2]重庆大学成立宣言.重庆市档案馆历史档案资料,1929.
- [3]伍子玉.重庆大学校史(上册)[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4.
- [4]成有信.比较教育学导论[M].北京:中国文化书院出版,1987.
- [5]周勇.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史[M].2002.
- [6]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N].中国青年报,2003-05-29.